



Studies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美国文明研究论丛

从亚当斯到杰克逊 ——美国早期精英政治的兴衰

钱满素 主编
汪凯 著

From Adams to Jack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arly
American Elite Politics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Studies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美国文明研究论丛

从亚当斯到杰克逊 ——美国早期精英政治的兴衰

钱满素 主编
汪 凯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亚当斯到杰克逊：美国早期精英政治的兴衰 / 汪凯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

(美国文明研究丛书 / 钱满素主编)

ISBN 978-7-5117-2831-9

I. ①从… II. ①汪… III. ①亚当斯, J.Q. (1767 ~ 1848) - 政治思想 - 研究 ②杰斐逊, T. (1743 ~ 1826)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① D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6341 号

从亚当斯到杰克逊：美国早期精英政治的兴衰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巍

责任编辑：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187 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https://weibo.com/cctphome)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55626985

总序：探究文明的活力

余世存

悠悠三十八亿年，地球上的生命形态从无到有、由低向高，终于进化出人类这一近乎奇迹的结果，对之我们不能不怀有敬畏之心。科学家估计，仅从早期智人进化到现代人就历经漫长的二三十万年，而现代人是惟一幸存的人属。当然，这些数字不可能那么确切，也不是生不满百岁的我们所能体验的。比较确定的是：可以称为文明的人类历史不过五千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还很年轻。

在饥饿的驱使下，这个头脑发达、直立行走的裸猿不止一次地走出东非大裂谷，勇气非凡地散向全球各地。一切生物存在的不二法则就是适应环境，人类各群体在适应其所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物质的、精神的，还有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文明的孕育过程。所有的文明都是人类整体文明的一部分，具有某些共同的性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类了。人类是高智商的，但不是完美的，他智慧而狂妄，富于攻击性，动辄诉诸武力。各文明内部充满争斗，乃至残忍的杀戮；不同文明遭遇时也一样，虽有和平融合，更有暴力冲突、征服消灭，这是人类所继承的动物基因所决定的。好在越来越多有理性的人类正在试图摆脱这一宿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种问题。

文明的分类颇为复杂，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兴旺；有独立发展形成的，也有其他文明派生出来的“卫星文明”。美国文明一般被

置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但还是有其鲜明的特点：它创建于启蒙时代，最具理性的构思设计；它没有需要甩掉的历史重负，而是充满好奇和活力地面向未来。这一人类最为年轻的文明自形成后一路高歌，发挥着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

对任何一种文明来说，最关键的是其初始阶段，即基因产生之际，这一点在欧洲人殖民南北美洲的历史中尤为明显。一旦胚胎形成，以后的发展便往往遵循最初刻下的轨道，除非外族入侵、自然灾害等猝然降临，才会诱发基因突变。文明基因的产生既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美国文明是英国的基因在北美新大陆自由空间中的变异，而它形成的机遇则是 15 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不可能有美国，这是从时间上定义美国——它是一个产生于现代的国家，跳过了史前、古代、中世纪等历史阶段，直奔现当代而来。当然，哥伦布并非第一个进入美洲的人类，早在最后一次冰期，人类就从西伯利亚经白令海峡陆桥进入美洲，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途径，基因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也有可能从欧洲和爪哇等地进入美洲，只是由于大陆板块的漂移，美洲与欧亚大陆彼此隔绝长达万年，相互不知对方的存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谁最早发现了美洲，而是谁的发现导致了最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哥伦布在 1492 年踏上美洲大陆的意义绝非早期进入的人类可比，这次发现不仅打通了欧美两大洲，还将地球上各自为阵的人类整合成一个世界，从此改变了人类的视野和生活。究其原因，离不开文明发展的落差，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欧文明已经强大到足以改变美洲，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科技水平都远高于原住民。假设反过来，15 世纪的美洲文明水平高于西欧，那么登陆后的哥伦布船队又会遭遇何种结果呢？也许就是美洲人来叩开欧洲的大门了。

英国并不是第一个殖民美洲的西欧国家。当时的海上霸主是西班牙，哥伦布是受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赞助才发现了美洲，虽然他本人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印度，于是便有了奇怪的“东印度、西印度”

之称，原住民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印第安人。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荷兰、法国，都争先恐后来到美洲开疆辟土，掠夺财富，横扫了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协议，狂妄地瓜分美洲，他们将本国的人口、君主制和天主教移植到此，开始直接的殖民统治。

直到 1588 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才有了更多插手美洲的机会，这时距离新大陆的发现已近一个世纪。有人问起：英国派了哪个将军、多少部队前往北美为殖民开道？学历史需要想象，而想象往往基于头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这一联想大概来于鸦片战争。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军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当时的北美大陆上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政府，当然也没有军队。原住民尚处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他们人数不详，估计不足千万，也就是不到今天北京人口的一半，想来是山南海北，踪迹难觅。他们散落在整个北美大陆上，主要以狩猎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有语言而无文字，有陶器而无铁犁，也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殖民者初到时和原住民一样，都只是随时准备自卫的平民小群体。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与在印度不同，不是去统治原住民，那里也没有南美的财富，英国是放手让移民去荒原上开辟自己的居住区，从而扩大英国的海外领地。作为新教国家，英国的殖民也从一开始就与南美不同，新教具有权力分散的特点，陆续建立的十三个殖民地虽然成立时方式各不相同，有皇家特派的，有以公司名义建立的，还有作为领地的，但具体的治理方式都是地方自治。弗吉尼亚的第一拨殖民者创建了北美大陆上第一个议会，英国议会政治在此扎根。史称“朝圣者”的第二拨移民在到达普利茅斯前，就在五月花号船上签订公约，宣布了立约自治和依法治理的政治原则。第三拨移民是一批有理想有纲领的清教徒，他们创制的“新英格兰方式”更是奠定了美国文明的基础。不同的文明基因就此在北美和南美分别播种、成长、发展，形成了如今南北美洲的不同景象。

但是，既然人类文明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英国文明就不可能在新

环境下保持原样不变。适合人口密集区域的领主与佃农的土地契约关系，到了广袤的自由土地上便很难维持，谁能阻挡人们去一望无边的“无主土地”上开垦自己的家园呢？人口的分散使自上而下的教会管束变得不那么容易，牧师们对几十英里外的教徒鞭长莫及，而教会自治本来就是新教的信念。在这个自耕农占大多数的社会里，个人摆脱人身依附，自由自主被认为理所当然。随着社会等级的藩篱被打破，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水涨船高。然而，在种种新关系的形成中，劳动力的匮乏导致了黑奴的输入，给这个原本比较健康的文明带来了严重的出生缺陷。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里，大部分北美人享受了自治的权利，习惯了自治的方式，任何来自大洋彼岸的国王和国会的干预都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的政治思想日臻成熟，超越了王权专制，他们对共和的信念精炼地表达在 1776 年的《独立宣言》中。独立战争使他们最终挣脱了英国的统治和王权的束缚，赢得彻底的自治权。接着，他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成立了现代世界第一个超大型共和体制——美利坚合众国。

为了一个更完美的联邦，他们反复斟酌，精心制定宪法，作为新国家的根本大法。在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上，宪法设置了一系列巧妙的关卡来分权制衡，既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又要保护公民的创造力。在 19 世纪结束前，新世界的美国人一直以代表未来的姿态反观旧世界，保持着警戒之心。

239 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无数次考验：西部开发既有拓荒者的艰辛，也包含对原住民的无情驱赶，还有耀武扬威的侵略战争；一场无比惨烈的内战结束了奴隶制，而南方的重建又伴随着尖锐的种族冲突；多次规模空前的移民潮冲击，大量身无分文的贫民从世界各地涌向这“穷人的乐园”，带来了不同性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待磨合相融；还有工业化、城市化、大萧条、世界大战……等等。如今，它的疆土扩大了不止三倍，人口从三百万增加到三个亿，经济繁荣，科

技发达，稳居世界榜首。美国人以四年重复一次的总统选举替代了王朝兴衰的重复，有效地避免了破坏性的社会震荡，这办法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智慧，体现了全社会高度的政治共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美国：表面上常现混乱，却并不妨碍它根基的稳定；内部的反对者层出不穷，却从无将其推倒重来的企图，因为天下已经为公。每次面对问题与挑战，美国人以实用主义的心态，寻找解决之法，也每每能有惊无险，继续前行。这一切的奥秘在于，自我更新所需的竞争与变革机制就设置在合众国宪法之内——人民的自决权、官员的竞选产生、宪法的修正案等。若无宪法对自由、开放、多元的保障，美国就不可能保持活力，也就不可能如此稳定，哪一个专制王朝能够在开国 239 年后不陷入内乱外患的颓势呢？事实上，美国建国后的体制与殖民时期一以贯之，如果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四百年。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序言中剖露了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在 1915 和 1916 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的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汤因比活到了 1975 年，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想必他更加发奋著书。当我们把人类不同部分纳入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时，我们更容易超越国界，突破自身局限，摆脱自我中心，在平等的基础上客观对待其他文明，而不是那种妄自尊大，居高临下，以各种借口挑动文明斗文明，给人类造成灾难。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太多了。

在研究各种文明的兴衰后，汤因比发现：“自决能力的丧失是判断文明衰落的最终标准。”任何文明在走向解体之前，必先经历停滞，而停滞的先兆就是封闭。当个体的自决权被取消，当一个社会统一到毫无异议，便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再有创造力，也就失去活力。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一种长期停滞的文明在具有活力的外来文明冲击下

都是不堪一击的。美国文明还能走多久，完全在于它是否能保持其活力，继续容纳多样性，拒绝封闭。

文明研究，包括美国文明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术领域，有待大家的探索。本丛书是南京师范大学美国文明研究所的最新成果，它们跨越了美国四百年历史，涵盖多个重要题材：从美国的精神源头清教开始，延伸到社会的世俗化进程、自治传统的保持、政党政治的形成、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现代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的形成演变，试图对认识这一文明本身作一些深入的努力，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批评。



目 录
Contents

总序：探究文明的活力	1
导论	001
第一章 精英政治与北美殖民地的精英政治传统	014
第二章 约翰·亚当斯：美国早期精英政治的理论家和忠实倡导者	028
第一节 亚当斯政治思想来源及其体现	030
第二节 亚当斯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040
第三节 美国宪法原则与亚当斯的政治思想	053
第四节 亚当斯精英政治思想的实践及其影响	067
第三章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早期政治的改革者	084
第一节 杰斐逊民主的思想根源	086
第二节 杰斐逊民主的保守性	091
第三节 杰斐逊民主的两面性	118

第四章 亚当斯与杰斐逊的对立	124
第一节 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歧	125
第二节 政府组织原则的分歧	136
第三节 分歧的实质	146
第五章 安德鲁·杰克逊：美国大众政治的开创者	150
第一节 杰克逊时代精英的衰落和大众的崛起	153
第二节 杰克逊及其民主的内涵	158
第三节 杰克逊民主与杰斐逊民主	168
第四节 杰克逊民主的影响	174
结语	184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197
索引	200

导 论

纵观美国历史，其建国距今不过区区两百来年，如果算上最早的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也不足四百年。但是就在这几百年间，美国完成了从分散到统一继而走向强大的过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殖民地时期到建国时期是美国发展的重要阶段，主要的民主思想、政治理念、建国原则等均在此时形成，为整个国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从本质上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也可以为了解当前美国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提供参考，并对其发展趋势作出合理的预判。

与美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殖民时期显得十分重要，尽管它只有一百多年，“但这还不仅仅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是美国民族的初创阶段，或者说奠基时代，故而孕育了美国日后发展的所有基因，决定了美国的未来。”¹当第一批清教移民来到北美大陆时，他们也带来了一整套传统的英国治理模式。与英国的清教徒为信仰而不惜诉诸武力所不同的是，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们只需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建立自己理想的国度，上帝的选民与建立山巅之城²的使命感是支持清教徒在荒野之地生存下去的坚定信念。由于新大陆幅员辽阔，任何信仰都能在此地找到容身之所，哪怕与清教格格不入的学说也是如此。对此，

¹ 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

² “山巅之城”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原文如下：“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认为，“在英国，一场会导致清教内部产生一个新教派的争论，在新英格兰却只会产生另一块殖民地。周围广袤无垠的空地和荒野使新英格兰的牧师们无需在自己的神学中形成容纳变种的宽容性……”¹ 新英格兰清教的宽容有具体的历史、地理原因，但这并非意味着清教信奉绝对的自由，在对异端的迫害上，清教是毫不宽容的。一些史学家认为清教的不民主或是寡头政治，实际上限制了美国民主化的进程，考虑到当时的传统和现实，这种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众所周知，清教徒在欧洲遭受的迫害是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正因为有切肤之痛他们才会分外珍视这荒野之地的自由，也无法容忍弥足珍贵的信仰受到异端邪说的冲击。另外，移民初到北美时遭遇到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非自然减员，使得诸如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等清教领袖们决意通过维护信仰的纯洁性和惟一性来凝聚人心，从而站稳脚跟。实际上，清教所谓的寡头政治并非维护专制制度，它所反对的也不是民主制本身，它的不民主主要体现在对直接民主的反对，或者说是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而言清教民主政治属于精英政治的范畴，它认为当时的民众还无力自治，这一点可以从清教神职人员的产生方式、信徒资格的确立等看出。温斯罗普在1645年的一次集会中将自然自由与道德自由作了区分，对这两种自由，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认为，“前者是‘一种走向邪恶的自由’，而后者则是‘一种只行善事的自由’。这种自由定义的基础是对自我的否定和对道德的选择，与当时那种对言论、宗教、运动和个人行动自由的严格限制是非常吻合的。”² 这是自由相对性的体现，也是清教民主相对性的体现。在清教统治的殖民地，权威不容许蔑视，否则会被科以刑罚。由于清教的特殊成因和发展，使得其本身充满了悖论，它一方面强势地控制信众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民主的特点。虽说清

¹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历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² [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页。

教对待异端毫不宽容，但是在其成员内部则实行宽松政策，最明显的就是代议制的实施。民主选举产生的村镇议会成为地方决策机构，神权政府的成员由从大众中脱颖而出的，少数最优秀的人组成。他们凭借物质和道德上的优势对殖民地民众实行思想上的绝对控制，使得后者不能有丝毫越雷池之举。

清教神权政治通过严格控制信仰，党同伐异，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其思想上的纯洁性。但是，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异见者不断出现，清教得以维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如何在不断增长的民众面前保持清教的地位，成为了清教寡头们殚精竭虑的问题。这说明，少数精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独断专行、我行我素了，他们开始适应大众化社会的潮流，开启了清教世俗化的进程，这也表明出民主政治在殖民地已经出现了初步的萌芽。**1730** 年代殖民地出现的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宗教复兴运动，不仅没有强化清教的统治，反倒从客观上提高了普通信众的地位。随着清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其所包含的民主、自由的色彩日益凸显，民主思想在殖民地不断延续。

清教的民主基因得到传承，殖民地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然而英国政府对待北美一贯采用打压政策，试图将殖民地变为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的附属。对此，视维护自由为己任的有识之士纷纷撰文，在批判英国的同时也极大地唤起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史学家伯纳德·贝林 (**Bernard Bailyn**) 在《美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对流行于革命时期的思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通过选取舆论宣传的主要工具——小册子作为研究对象，贝林发现这些看似凌乱、随意的宣传形式实则具有鲜明的主题和明确的目的，即其一，英国政坛业已腐败，直接表现就是对殖民地肆无忌惮的压迫；其二，殖民地的使命在于恢复原本纯洁的政治体制，以有效地抑制腐败。阴谋论和使命论是贯穿于革命论战始终的两大要点，一些原本在英国毫无市场的思潮，如乡村派思想在北美却大行其道，成为革命者理论的主要基础，并且在实战中作用明显。为何这些并

非新生事物的革命理论受到革命者不遗余力的宣传，并且产生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受众？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受萌芽于清教时期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从为了实现山巅之城的目标而建立殖民地到村镇自治制度，从对思想严格控制到教会制度的改革，清教神权政治的这一系列变化使人感受到，先前远离民众的政治逐渐受到提倡并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民众不再被动地受制于精英，政治精英们在议政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民众的情感与诉求，革命期间许多小册子的宣传对象就是普通民众，目的是激起他们对母国的反感，从而为新的革命方式奠定群众基础。

在林林总总革命著作中，后来成为美国独立后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撰写的《论教规和封建法》(*A Dissertation on the Canon and Feudal Law*) 无疑是殖民地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典范之作，它充分表明了当时民主思想在殖民地已经深入人心。亚当斯的立论之处在于美洲自清教以降的自由传统，即移民到达新大陆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此文的强烈民主意识，它在反印花税的斗争中发挥了奇效。尽管亚当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清教徒，但由于家庭背景以及所接受的教育，亚当斯继承了许多清教精英政治的主张，在去除了其专制、垄断的消极面的前提下，突破性地将其中的理性、秩序、平衡的因素发扬光大，形成自己独特的民主思想。亚当斯身上体现了许多精英政治的特色，其表现在于维护既定的秩序，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革命的目标，反对一切诉诸暴力。因此他总能在群情激奋之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时甚至是与大众背道而驰，他在波士顿惨案中的表现是为一例。当然，这种态度并非是脱离大众，它实际上充当的是大众情绪狂热之时的镇静剂。因为群体的热情一旦被煽动，革命者固然可以从中实现目的，但若不加注意，民众的激情瞬间便会失控从而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美国建国之后，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等联邦党人在构建新政府的计划中充分借鉴欧洲古典政治传统，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并由此确立了美国民主的内涵。这种成果也是通过唇枪舌剑的论战取得的，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内

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联邦党人代表工商利益，维护联邦权而非州权。他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合众国能更好地维护法律，促进经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联邦党人的代表在当时的美国政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以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德高望重的人物为后盾，以一批年富力强且善于运作的人物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和约翰·杰伊 (John Jay) 等为得力干将，以《纽约邮报》等报刊为阵地，向美国民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相比之下，反联邦党人大多都是农民和产业工人，就凝聚力而言，反联邦党人缺乏有足够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代表，其中有些人甚至达不到参加选举代表所要求的财产数额。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孰胜孰败一目了然。联邦党人以自身的魅力，严密的组织以及上层的支持而获胜，而反联邦党人则被看作是失败者，逆潮流而动之人。但是实际情况并非简单的成王败寇，两派之间的论争其实质是精英与大众的一次对垒，联邦党人位高权重，大多出身富有之家，代表东部政治精英，反联邦党人多是无名之辈，他们充当的是大众的代言人。虽然后者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杰出的人物，但他们凭借直觉和已有的思想积累，敏锐地感觉到了大政府、集权制对大众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来质疑联邦党人的观点。虽然他们在与联邦党人的论战中失败了，但值得庆幸的是联邦党人并未忽视他们的担忧，而是以审慎的态度来考量其观点，在随后的宪法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对州以及个人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将这些观念贯彻至宪法的指导思想中。一些措施，如两院制、官吏的人数、产生方式和任期、权利法案等，都渗透着反联邦党人的思想和智慧。赫伯特·J·斯托林 (Hebert J Storing) 在《反联邦党人赞同什么》一书中认为，“反联邦党人至少看来有兴趣作为前现代、前工业以及前自由世界残留原则的辩护人。……反联邦党人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

派。”¹的确，反联邦党人这个标签很容易招致误读，实际上，他们并非彻底地反对联邦制，反对宪法，从根本上而言，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联邦主义者阵营中的保守派。他们立足于传统自由观，以维护个人自由，州自由为己任，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分裂联邦，取消宪法，当联邦党人承诺将权利法案加入宪法后，他们也表示接受。这场精英与大众的第一次交锋最终以后者的妥协而结束，独立后的美国消除了争端，在精英们的带领下逐渐走上了正轨。

精英主导政治的好处在于其理性，深受欧洲民主思想熏陶的有识之士对既往政治制度的优劣稔熟在胸，故而能精妙地设计出新世界的种种制度以免重蹈旧世界的覆辙。然而，随着民智逐渐开启，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姿态的贵族政治似乎离民众愈来愈远。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位时期通过的旨在限制民主共和党人的客籍法和反颠覆法 (*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因其带有明显的限制大众参政，压制大众舆论的色彩而饱受诟病。对此，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秘密起草了肯塔基决议案 (*Kentucky Resolution*)，詹姆斯·麦迪逊也起草了弗吉尼亚决议案 (*Virginia Resolution*)，强烈谴责了上述破坏民权的法案和联邦政府无视州权的行为，开启了州权对抗联邦权的先例。另外，亚当斯本人的贵族做派也令反对者深感不满，各地的民众也对联邦政府的重税和高压政策怨声载道，宾夕法尼亚州甚至爆发了农民起义，结果遭到了联邦政府的镇压。精英政治至此在美国已经走入了歧途。联邦党人的错误在于一意孤行地推行精英政治理念，过分强调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忽视各州利益，对民众的诉求不加重视，因此当更贴近大众的杰斐逊在 1800 年取得总统选举胜利时，民众不禁拍手称快。

代表精英政治的联邦党人退出政治舞台后，素来以重农轻商以及亲

¹ [美]赫伯特·J. 斯托林著，汪庆华译：《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2 页。